



宣侠父在早期甘肃革命斗争中的贡献

宣侠父，浙江诸暨人，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特种水产学院，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准公费去日本留学，回国后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时期，宣侠父来到甘肃，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为甘肃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锐

建立甘肃地方党组织

1925年春，宣侠父受党组织派遣到李大钊处工作。同年夏，李大钊根据与冯玉祥达成的协议和国民党开展政治工作的需要，安排共产党员宣侠父、钱靖泉等人前往国民军驻地张家口做政治宣传工作。1925年9月，甘肃地方军阀李长清发动兵变，夺取了甘肃省省长兼陆军第一师师长陆洪涛的大权，自任师长。为了稳定甘肃局势，北京政府任命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兼任甘肃军务督办。冯玉祥随即任命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为总指挥，代行甘肃军务督办，率军西征。宣侠父、钱靖泉等人以国民党党务特派员和政治宣传员的身份随军西进。国民军从包头出发经宁夏进驻兰州后，设计诱杀了李长清及其死党，控制了兰州局势并逐步掌握了全省政权。

宣侠父、钱靖泉等人到达兰州后，不仅在国民革命军内外开展各种形式的政治宣传，而且根据中共北方



区委和李大钊关于建立甘肃地方党组织的指示，与之前到达兰州的甘肃籍共产党员张一悟取得联系后，准备在兰州建立甘肃地方党组织。1925年12月，张一悟、宣侠父、钱靖泉在兰州召开会议，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张一悟任支部书记，宣侠父、钱靖泉为支部委员。这标志着甘肃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有组织的革命斗争，使灾难深重的甘肃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以后，积极开展工作，动员工人和农民建立工会、农会，创办刊物，培养进步骨干分子，秘密发展党员，壮大党组织的力量。

帮助国民党整顿和发展党务

1925年7月，国民党甘肃省临时党部秘密成立，但是由于被官僚、豪绅和投机分子所把持，所以只有空招牌并没有实际革命活动，虽经数月秘密活动，成效实微。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以后，根据国共合作形势下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指示精神，以及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安排，宣侠父、钱靖泉了解到国民党甘肃省临时党部有名无实、一筹莫展的情况以后，主动帮助国民党甘肃省临时党部整理和发展党务，由甘肃省府拨出党务活动经费，正式建立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和兰州市党部，公开挂出了国民党省、市党部的牌子，积极开展活动，工作局面焕然一新。

宣侠父等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向群众宣传新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阐明孙中山制定

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必要性，以及为什么要实行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的革命道理，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幸福生活，鼓励群众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中去，不断激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宣侠父等人在中等学校师生中公开发展国民党党员，还帮助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创办了党务工作人员培训班，培养党务工作人员。宣侠父思想活跃，性格开朗，善于辞令，文采飞扬，活动能力强，活动范围广，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物中影响很大。与此同时，针对国民党右派企图篡夺党权的阴谋活动，宣侠父等联合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了坚决斗争，给国民党右派势力以沉重打击，取得了反对右派分裂活动斗争的胜利。

支持甘南藏族群众反对封建军阀欺压的斗争

1918年，回族军阀西宁镇守使马麒派军队进入甘南，烧杀抢掠，横征暴敛，蹂躏百姓，拉卜楞寺五世嘉木样及其父亲黄位中多次电告北洋政府及各方军政要员，但是均毫无结果。1925年底，宣侠父见到了赴兰州控诉的拉卜楞寺五世嘉木样的代表黄正清、罗占彪，了解到整个事件的全部情况，随后向中共甘肃特别支部进行了汇报，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决定宣侠父、钱靖泉具体负责这件事情。在宣侠父的帮助下，黄正清等人在兰州成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宣侠父在草拟的《藏民文化促进会组织大纲》中，提出了“提高藏民文化，使得与国内各民族有平等之地位；更进而与国内民族共同奋斗，要求中国民族国际地位上之平等”的根本宗旨。宣侠父等人教藏民文化促进会会员学习汉语和汉字，向会员讲解革命形势和民族平等的政策，组织会员和进步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使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

1926年7月，宣侠父在罗占彪等人的陪同下，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亲自访问了甘南藏区。他调查了甘南的社会经济情况和风俗民情，目睹了惨遭屠杀蹂躏的藏族僧俗群众的苦难状况，耐心听取了各界人士的意见和要求，启发他们加强团结，反对军阀的压迫。宣侠父鼓励黄位中等人首先团结近地的藏民，再慢慢由近

及远，去联络所有的藏民，在整个组织之下，集结起来，然后再设法提高一般人民的文化，充实自身的武力。在宣侠父的建议下，黄位中召集了方圆400里内的230多个部落头人，组织成立了甘青藏民大同盟，宣侠父起草了《甘青藏民大同盟宣言》（带到兰州印发时改名为《甘边藏民后援会宣言》）。宣侠父向部落头人讲解了成立大同盟的意义和作用，随后，他拔起一把草拧成股用力扯，扯不断，然后又分开一根一根扯断，比划着说：“看到了吗？草要是拧在一起，力量就大，拉不断；人也是一样，只要团结，就谁也别想欺负你们。”1926年9月，国民军在兰州东教场召开的庆祝五原誓师大会上，散发了由宣侠父帮助起草的《甘南藏民泣诉国人书》，以恳切的语言、犀利的笔锋，历数了马麒压迫和掠夺甘南藏民的罪行，大大震动了马麒等军阀。

在宣侠父等人的帮助下，在国民党的压力和社会舆论的谴责下，马麒的代表和黄正清最后达成协议，签订了解决拉卜楞案件条件，标志着甘南藏族僧俗群众反抗军阀残暴统治斗争的胜利。这是党的早期民族工作的一次光辉实践，开创了党的民族工作的先河。

1926年11月，宣侠父奉调前往西安，继续在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宣传工作，从而离开了战斗和工作一年多的甘肃。 据《学习时报》

鲁迅和谜语

鲁迅从小就非常喜欢谜语，小时候的夏夜，鲁迅总是喜欢躺在家门口的大桂树下的小桌子上，他的祖母摇着芭蕉扇，教他猜谜语。后来，鲁迅到绍兴乡下安桥头的外婆家，结识了一些少年朋友，他就常和他们在一起猜谜语。后来，时隔多年，鲁迅还在他的小说《长明灯》里描写了儿时的猜谜乐事。

鲁迅还经常幽默地用谜语来写信、题书名和笔名。1933年6月20日的晚上，鲁迅在给林语堂的信中这样写道：“不准人开一开口，则《论语》虽专谈虫二，恐亦难，段盖虫二亦有谈得讨厌与否之别也。”这里说的“虫二”就是一则非常有趣的谜语。据说清朝的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到杭州饱览了西湖美景之后，就在这里信笔题写了“虫二”两个大字，这两个字就是一个谜语，暗中隐藏着“风月无边”的意思。鲁迅借“虫二”这个谜语隐藏的“风月无边”之意来讽刺林语堂编的《论语》杂志里都是谈风月的小品文，这些谈风月的小品文很是无聊。

另外，鲁迅写的《且介亭杂文》这本书中的“且介亭”三个字也是一个有趣的谜语，隐藏着“半租界亭”的意思。当时，鲁迅住在上海的闸北，那里虽然不是租界，但是，洋人在这里却霸道而跋扈得如同租界的亭子间里，鲁迅把在这“半租界亭”里写成的文章汇编成一本书，这本书取了一个《且介亭杂文》的谜语式的书名。

鲁迅还有不少谜语式的笔名，比如他的笔名“华圈”就是一个谜语式的笔名，这个笔名隐藏着“当时中华是个大监狱（圜）”的意思，借此来比喻当时社会的黑暗。

王吴军 据《人民政协报》

丰子恺“偷”诗

李叔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诗人、作家、音乐家和教育家，丰子恺跟随李叔同求学期间，深得李叔同的赏识，丰子恺对于恩师李叔同的才华和人品也极其敬仰，师徒二人情谊深厚，惺惺相惜。

1928年2月，李叔同在杭州灵隐寺落发为僧，法号“弘一”，随后到浙江慈溪的伏龙寺做了客师和尚。第二年，弘一大师把自己一生的诗作精心挑选、认真誊写、汇编成册，却并没有交给出版社出版发行，而是将这些诗稿藏在寺院之中。

当时，作为弘一大师的得意弟子，丰子恺和史良、邹韬奋、沙文汉等人屡次上伏龙山拜见弘一大师，并多次恳求弘一大师，希望他能将诗稿拿出来，交给出版社出版。但是，丰子恺等人的恳求被性格特别耿直的弘一大师断然拒绝。于是，丰子恺等人便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当时，弘一大师有一个小徒弟，才8岁，生得聪明伶俐，深受弘一大师的宠爱，这个小徒弟经常出入弘一大师的禅房。丰子恺等人就用糖果和橘子等食物诱惑弘一大师的小徒弟，叫他偷偷拿出了弘一大师的钥匙，然后，丰子恺把弘一大师的诗稿“偷”了出来。

随后，丰子恺把弘一大师诗稿中的每一首诗都配了画，由邹韬奋负责，交给当时的商务印书馆以最快的速度编辑出版，书名叫做《护师录》。《护师录》一书出版后，丰子恺将新出的书和18700元稿费邮寄给了弘一大师。

弘一大师知道此事后，十分恼火，他立刻写信把丰子恺狠狠骂了一顿，使丰子恺从此再也不敢上门面见弘一大师，直到弘一大师在福建病逝后，丰子恺才来到弘一大师的灵前缅怀恩师，痛哭不已。 王吴军 据《人民政协报》